

北宋党争与文学

导师：程千帆、周勋初 撰者：巩本栋

北宋党争的时间延续之长，卷入的人数之多，斗争的复杂激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其影响亦及于北宋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本文主要从党争的角度，对北宋一代文学进行考察。

一、北宋党争的背景与原因

北宋党争自真宗朝起便绵延不断，且愈演愈烈。这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背景。

首先，北宋相权的上升和台谏作用的加强以及皇帝对二者的制约和利用，构成了党争的政治背景。宋初，太祖、太宗一面高度集权，一面奉行重文抑武和令百官相互约束的国策，使唐末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外重内轻的局面颇为改观。但其促使百官相互制约的措施，既不能完全奏效，也不符合整个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而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执政集团，权力得以上升。这种情况自真宗朝以后愈益明显。如在人事任免方面，宰相大权在握，甚至皇帝想用或想贬之人，如宰相的意见与之相左，也未必能成，而皇帝的策立或亲政，时亦颇赖大臣拥戴。在军事上，宰相于真宗朝已屡参军旅大事，仁宗朝便兼任枢密使。在财政上，相权亦逐渐扩大，到神宗时财权便统归宰相。所以当时已屡有人指出：“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六《乞不更责降王陶札子》）

相权过重，则君权相对削弱，从而使执政党同伐异，“我憎之能得罚于君，我爱之能得赏于君，政在于臣，党与成群，君则孤而无民。”（《宋景文笔记》卷下）相权过重，又“使中材之人料时之如此，欲自结于朝者，还附于权党，欲自徇于公者，反入于私门。”（李焘《长编》卷一二一仁宗宝元元年正月）

台谏在宋初政治舞台上并没起多大作用，然而自真宗后期起，台谏渐为皇帝所重，其任免、人数、职责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规定，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在维护皇权，约束相权和限制母后的活动等方面，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台谏限制宰辅，宰辅当然亦试图控制台谏，而台谏和宰辅最终必然均为皇帝所用，此即所谓仁宗“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守祖宗法度”（《邵氏闻见录》卷二）。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做法，固然是为维护皇权计，但客观上却很容易造成党争。正如王夫之所云，北宋“季世之天下，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宋论》卷四）。

其次，北宋士人重名节尚志气、重师友交游和侥幸告讦的风气，构成党争的文化心理背景。北宋统治者的崇儒重文，士大夫中杰出之士如王禹偁、范仲淹、曹修古、唐介等人对儒学的提倡，使“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于是推演激荡，蔚成风气。而当士人对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作出判断和抉择时，必定会较多地从国家利益出发，勇于议论，各持己见，或相互排斥，相激相争，由此分派；或互通声气，相互支援，由此亦成派。

亲师取友，互相切磋，历来是儒家所提倡和重视的为人处世的方式，而有宋一代的崇儒重文，更给师友交游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二程之门诸友若游酢、谢良佐、吕大临、杨时，东坡之门若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儒学、文艺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风，不其盛欤？”（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一）

交游之风既盛，则自然有相互推举奖掖；师从学问不同，则又往往互不相下，二者都易促成结党分派。

与相权的上升和台谏作用的增强以及重名节重交游的士风相联系，且与统治者利用言路监控臣下的心理和需要相顺应，北宋的侥幸告讦之风也很盛。这种风气掺杂在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中，交织在相权与台谏的互相利用、互相排抵之中，时时为党争提供契机，加剧不和的气氛，对党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次，王安石、司马光、二程、苏轼诸家政治理想的异同，又构成了党争的思想背景。北宋中期是一个亟需变革的时代，但在如何变法甚至是否应该变法的问题上，当日士人却多有分歧，以致分党结派，势同水火。究其原因，乃与诸家哲学观点和政治理想不同有密切关系。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以心学为本，以法先王，行王道，追求尧舜之治为理想政治，以为“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因而不屑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但求“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八《王霸》）的理想境界，也就是王安石所谓“虽不求利，而利之所归”

（同上）。二程亦主张法先王，行尧舜之治，但又认为这要“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程颐《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必也稽之经训而合”（同上卷一程颢《论十事札子》），因而坚执王霸之效，力辨义利之分。司马光重天命，主中和，推衍及政治，则认为“国家受天明命，……混一区夏，……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七《请更张新法札子》），“后世所宜谨守，不可失也”（同上卷四十九《革弊札子》）。苏轼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主人情论、中庸论，政治上“但较量汉唐”（晁说之《晁氏客语》），不务高远，只主张名实相副，宽猛相济，情理相合，反对过激。就哲学观点和政治理想而论，王安石与司马

光迥异其趣，所以在变法问题上势必对立；王安石与二程同中有异，故在变法中先合后分；苏轼与其他数家皆不相同，因此在新旧党争中始终不得志。

正是在上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北宋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派别的士人，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长期激烈的斗争。

二、北宋党争之批判

北宋党争自仁宗初年至北宋之末，可分为四个阶段，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变法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斗争。

（一）范仲淹天圣六年（1028）谏仁宗率百官给刘太后上寿，明道二年（1033）谏仁宗废郭皇后，景祐三年（1036）谏吕夷简为相专权，三谏而三贬，由此还牵连到了欧阳修、尹洙等一大批士人，朝中臣僚纷然成派，这是党争的第一阶段。这时已反映为因循与变革两种政见的斗争。

（二）庆历党争。仁宗用范仲淹为相进行变法革新，得到富弼、杜衍、欧阳修等有识之士的支持，也遭到章得象、王拱辰及宗室贵族、宦官等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结果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被贬。

（三）熙（宁）（元）丰、元祐新旧党争。这场斗争远比庆历党争更复杂、更激烈。熙宁初宋神宗用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参与制定、推行和支持新法的，有吕惠卿、陈升之、章惇、曾布等，史称新党。完全或部分反对新法和一度支持后又反对新法的，以司马光、文彦博、吕诲、二程、二苏等为首，史称旧党。终神宗之世，新法虽遭到旧党的激烈抨击，但变法的总的方向未变，且取得很大成效，新党也基本上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旧党受到排斥。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旧党人物掌权，尽废新法，新党均被贬斥。元祐年间的洛蜀党争，是新旧党争的

继续和扩大，是新旧党争的组成部分。

(四) 哲宗绍圣以后至北宋末，新党执政，旧党屡遭贬斥，然党争的性质已逐渐改变，变法已不是党争的核心和目的，而成为党争的手段和借口，权利之争、意气之争、恩怨之争的成分更多。这是党争的最后一个阶段。

对北宋党争的评价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党争双方孰是孰非的评价。党争的实质既是围绕变法而展开的思想、政治斗争，而变法又势在必行，且获得很大成效，则就党争这一问题而言，就双方在党争中的主要倾向而言，则理当给在庆历、熙丰党争中力排异议，主持变法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以较高的评价；对继王安石之后坚持和恢复了新法的吕惠卿、章惇等，也应给予好评；对在上述斗争中因循保守的吕夷简，蓄意打击报复革新派的王拱辰、夏竦等，应作批判；对力反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也应结合历史说明他们的局限；对崇宁以后冒新法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的蔡京之流，则理应贬抑。至于元祐洛蜀之争，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是思想斗争，作为思想斗争，其间有异同，却无需判其是非。第二是对党争影响北宋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方面的评价。初期党争曾给北宋政治注入活力，也曾某种程度上起过政治监督作用，纠正了新法的某些失误，但后期的党争则造成政局反覆，人心惟危，士风颓败，民不聊生。党争是北宋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背景，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思想学术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多种思想方法的形成。党争还使前代史的编纂受到影响，使当代史的撰写成为党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北宋党争与文学思想的分化及其影响

(一) 北宋文学思想的分化与斗争

北宋党争的实质是思想政治斗争，思想政治观点不同，文学思想往往也不一致。北宋文学思想可分三派，均对文学的发展产

生过重要影响。

王安石主张法先王、行伊周三代之治，于是以治教政令为文，而以文学之文缘饰治道。王安石学根孟子，强调主观自得，论文亦主张自得其志，重性情之真，反对模拟造作。这种文学思想影响于创作，是力图使文学肩起治国经邦的重任，使文学植根现实，它有助于扫除浮华靡丽的不良文风，有助于其自身创作的独立成家，有助于文学发展，但王安石以治教政令为文，则对文学之士、文学之文不免轻视，这又导致其后废诗赋，行经义，改革进士科举等措施的制定。

二程思想学术有因党争相激而成的因素，二程主张诚敬格物以致天理，而视王安石新学为舍本逐末，视苏轼文章之学为舍内求外，又认为诚敬识理即是有文，作文必须合道，而反对作文害道，不但自己不作文（如程颐今存诗仅三首），且不满别人作文，文学思想不免偏激。

苏轼主人情论、中庸论，融合儒释道，而论文尤受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影响。他认为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尊重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文学创作主体方面，要顺应作家情感抒发的自然，尊重创作个性；在创作客体方面，要随物赋形，尽其妙，形神毕肖地表现客观事物的特点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反对对文学多加限制，横加干涉，更反对程式化。苏轼的这种文学思想，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家文学思想既受其政治、学术思想的影响而各立门户，反过来则又为各家的文学思想抹上了一层党争的色彩，甚而成为党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苏轼主张尊重作家情感抒发的自然，心口一致，心既不满新法，“则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苏轼文集》卷六十七《录陶渊明诗》），而杨时却发挥有关圣人气象的师说，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抨击苏轼的好讥骂嘲讽。

党争不仅是思想方面的斗争，更是政治斗争，它当然也影响

到文学思想的发展。如，欧阳修对诗穷而后工理论的阐述和强调，本是为梅尧臣而发，而梅的不遇又主要是因陷入庆历党争的夹缝而造成的，所以欧阳修对这一理论的阐述便是党争背景下的产物。黄庭坚论诗由推崇“善陈时事”（《潘子真诗话》），转向“文章垂世，要须尽心于克己，不见人物臧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后》），同样是党争影响的结果。

（二）进士试经义策论与试诗赋之争对文学的影响

北宋党争的内容之一，是进士科取士试经义策论还是试诗赋的问题，斗争的焦点和实质，是如何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地位，由于各家看法不同，导致了这种纷争。在这种纷争中，试经义策论的主张和改革基本上占了上风，因而这里着重阐述试经义策论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范仲淹等人在庆历革新中，力主进士试先策论后诗赋，其目的不只是为了为北宋政权培养有用之材，也是要以儒家经术结合实际政事，救宋初以来浮华柔弱之文，这就恰与北宋诗文革新者倡古道、作古文，反对浮华文风的目标一致，而由于科举取士自唐代以来几乎已是士人进身仕途的唯一出路，科场所重，便是士人所习，所以这种改革也就给予诗文革新以远比一般文学家的倡导更大得多的推动。虽然庆历革新不久即告失败，进士试改革似乎也随之而废，但对进士试所作的实际改革，并未完全停止，由张方平和欧阳修分别在庆历末和嘉祐初对科场文风的改革，便是庆历初进士试改革的继续，只不过庆历初的改革采取了以质救文的积极措施，张方平和欧阳修主要采用的，是对文风不正的举子一概黜落的办法。总之，范仲淹等人对进士试的改革，加快了北宋诗文革新的进程，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王安石以治教政令为文，视文学之文为无益于治政，力主改革进士试，废诗赋，行经义，以统一士人的思想和学术，服务于

熙丰新政。这就比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激烈得多。废诗赋，士人不再习诗赋，则自唐代以来以诗赋取士的一些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因素也就消失；专以经义取士，使考试内容太狭窄，则又更进一步地泯灭了士人的聪明才智，摧折了士人的创造性，不仅使士人难以成器，文章亦复千篇一律。至于绍圣以后，进士试改革的性质转变为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倾轧。文学之士遭摧残，文学作品被禁毁，文学的发展也就更受到严重的阻碍。

四、党争影响下的文学

我们若对整个北宋文学作全面的考察，便会立即发现，文学对党争的介入固然令人注目，党争对文学的影响，却更广泛地表现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艺术手法的运用和文学风貌的形成、文人集团和文学流派的产生、发展，以及文学批评标准和方法的确立、运用等方面。

（一）文学题材和主题取向的变化

作为北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党争改变着士人的生活 and 心态，进而也改变着他们对文学题材和主题的选择。

熙宁党争之初，当士人面折廷争不能奏效而被驱斥外任，还处于一种积极参与的心态之中时，往往比以前更关注和了解政治生活的实际，更易于从现实中发现一些新法的失误和弊病，付之诗文，寓物托讽，希望为朝廷所采纳，也试图证实自己政治见解的正确。如苏轼屡言新法不当，未被采纳，于是辗转外任时，“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苏轼文集》卷二十九《乞郡札子》）黄庭坚熙丰间任职下僚，亦多有诗文批评新法实行的失误，劝戒执政“听言之道，必以事观之”（《山谷外集》卷十一《按田·序》）。

而在对新法的批评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下层人民痛痒的深切同情。象苏轼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

役》与苏辙的和作，贾收的《吴中田妇叹》与苏轼的和作，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黄庭坚《上大蒙笼》、《次韵邵之才将流民过悬帛岭均田》、《己未过太湖僧寺……》等等。不遑备举。

自然，在北宋党争中，又多有以诗文陈述己见，表明心迹者，如王安石作《寓言十五首》、《读进士试卷》、《众人》、《次韵吴季野再见寄》等；多有以诗文讥刺、攻击对方者，如梅尧臣作《猛虎行》、《啄木》等，托物喻人，抨击吕夷简，司马光撰《贾生论》、《廉蔺论》，苏轼作《商鞅论》、《王莽》等，借古讽今，攻王安石；亦多有因遭打击而怨争抒愤者，如苏舜钦在庆历党争中被削职为民，便不免“中怀百忧集”，“高吟但悲洒”（《苏舜钦集》卷二《出京后舟中有作……》），有相激而发为他人鸣不平者，如欧阳修屡作诗文慨叹石介贬死，黄庭坚作《观秘阁西苏子美题壁……》，痛惜苏舜钦的不平之遇。

从上述几类作品中，我们可见文学题材和主题取向与政治现实的接近。然而，当党争日益严酷，士人心态逐渐转向消极畏避之时，文学题材和主题的取向，则又日渐远离了政治现实，更多地转而抒写内心仕隐进退的困惑和对这种困惑的摆脱，转为对自然景物的题咏和日常琐屑事物的留连，以及师友过从的酬赠问答。如欧阳修庆历末贬滁之后的创作，苏、黄等人元祐初在馆阁中的唱酬，苏轼元祐末知扬州时开始的和陶，皆为其例。

（二）关于以议论为诗

宋人好以议论为诗，以至宋诗中议论的成分，较之前代诗歌，带有更大的比重，出现也更经常，成为宋诗的特色之一。个中原因，固然是受了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但同时亦深受北宋党争的影响。以议论为诗，固然是一个诗歌表现手法问题，但也是一个内容问题。

北宋士人“以言相尚”（《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

子固书》），“皆好议论”（《苏轼文集》卷四《思治论》），蔚成风气。所谓“议论”，即“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八《尹师鲁墓志铭》），但这并非空发议论，而是“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同上卷二《镇阳读书》》）。自北宋中期始，最重要，影响士人生活最大的时事，莫过于围绕变法革新而展开的党派斗争，则北宋士人的好议论，不仅深受党争影响，而且实亦属于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议论多为变法革新而发，常因党争相激而成。如范仲淹与吕夷简相争而作《近名论》等“四论”，欧阳修与吕诲等相争而有《濮议》四卷，至于因新旧党争而激发的议论更是举不胜举。又如在庆历党争中，革新派如欧阳修既可“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保守派中亦有“小人妄希旨，论议争操笔，又闻说朋党，次第推甲乙”（《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班班林间鸠》）。此种议论，无疑已成党争。

作为党争之一部分的议论，作为因党争影响而盛行的议论之风，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必然是以议论为诗，是使诗中的议论成分增加。因而党争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现实政治方面的题材和主题，也为文学提供着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方法。覆按那些议论成分较多，且又议论切实深刻，妥贴自然的作品，则可发现实以反映和介入党争的作品为多。象石介善善恶恶、震惊朝野的《庆历圣德颂》，梅尧臣寓物托讽，言辞犀利的《猛虎行》、《梦登河汉》，欧阳修为石介辨诬的《重读〈徂徕集〉》，王安石政论式的咏史诗《商鞅》、《贾生》，黄庭坚呼吁爱惜人材的《次韵文潜》、《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四等，皆为显例。由此亦可见党争对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影响。

（三）党争与江西诗派的形成

北宋党争又是江西诗派形成的重要社会政治背景和原因。这可从黄庭坚诗歌理论和创作的转变，以及党争与江西诗派成员的

关系两个方面来看。

黄庭坚谨奉儒家忠信孝友的道德规范，以为立身行事之本，认为“忠信孝友，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常久而后安之”（《山谷别集》卷十七《与徐师川书》四首其四），在政治上主张黾勉王事，“以养其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

（《山谷外集》卷十《与洪驹父书》六首其四）。这些观点虽似乎保守和平淡无奇，但在党争局势翻覆、士风日渐浇薄的北宋中后期，守此不移，则仍有其突出之处，尤其是他对人格修养的注重，更为我们理解其诗歌理论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与上述思想、政治观念相一致，黄庭坚在政事与文章的关系上更重前者，认为“文章直是太仓之一稊米耳。此真实语，决不相欺”（《山谷外集》卷十《与洪驹父书》六首其四）；在文学与人格和现实的关系上，则主张以忠信孝友为文学之本，“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山谷别集》卷十六《答秦少章书》）主张文学要“善陈时事”（《潘子真诗话》）。熙丰年间，黄庭坚任职下层写下了许多同情百姓疾苦，批评新法失误的作品，多用古体，少用典故，风格浑朴平易，与其文学思想是相吻合的。

然而，黄庭坚对新法的批评，既为赵挺之、蔡卞等新派之人所恶，元祐中又以置身苏门而难以升迁，绍圣以后更是始遭史祸，继则名列党籍，屡贬不赦，其诗歌理论与创作也就相应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党争剧烈、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势下，一方面，黄庭坚倡言不俗，特立独行，力求保持向来的人格操守，反对随波逐流。所谓不俗，即“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山谷别集》卷十《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书缙卷后》同）黄庭坚的大节，如在绍圣史祸的审查之中，“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亦即吴垞所说的“虽白刃在前，一色元祐”（《五总志》）。这种人格上的不俗，表现在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中，便是“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题意可诗后》）便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山谷诗集注》卷十二《再次韵（杨明叔）引》），艰苦锻炼，因难见巧，从而形成其奇崛拗峭，瘦硬生新的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黄庭坚又试图逃避和超越政治现实，以使自己的人格免受损害。他以不臧否人物为座右铭（《山谷外集》卷九《坐右铭》），以“士大夫之生，以口为戒”名其居（《山谷别集》卷二《密轩铭》），不仅注重人格的忠信孝友，更主张“养以敦厚醇粹”（《山谷外集》卷十《与洪驹父书》六首其一），主张“屏弃人事”，“静室焚香”，“尽心于学”（《山谷别集》卷十七《与徐师川书》四首其一），这种思想与心态，影响于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则又是主张“文章垂世，要须尽心于克己，不见人物臧否，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力学有暇，更精读千卷书，乃可毕兹能事。”（《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后》）主张温柔敦厚，反对所谓怒邻骂座，甚至自称“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同上卷十九《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以致将旧作焚去大半，将新作的题材范围愈益转向对个人心灵的自我观照，对日常生活中琐屑事物的题咏和亲友间的诗酒唱酬，将审美的情趣日益转向作品字句的锤炼、篇章的谋划、用事的创新和音律的讲求。

黄庭坚的思想和心态，他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受党争影响甚巨，江西诗派中的其他成员亦皆类此。他们在政治上一般都与旧党为近，并因此或列名党籍，遭到贬抑，或坚其所守，不与执政合作。比如，陈师道因政治上与新学、新党异趣，而不举进士，不见章惇，不求赵挺之，因苏轼等人荐任学官，又因附苏门而贬官、免官。黄庭坚之甥“三洪”、徐俯，前者皆坐元祐

党贬，后者则如晁说之诗中所云“人人垂首相公前，独子低眉古简编”（《嵩山文集》卷八《次韵师川郎中寄墨长句》）。韩驹从苏辙学而坐贬；谢逸、饶节、汪革等人皆出吕希哲门下，明确反对新法；潘大临、王直方师从苏黄和陈师道，“一会其意，涣然不疑，……终身守之不变”（张耒《柯山集》卷四十《潘大临文集序》），而吕本中之祖“希哲师程颐，本中闻见习熟，……绍圣间党事起，（其曾祖）公著追贬，本中坐焉”。（《宋史》卷三七六《吕本中传》）“政和初，……方崇尚王氏学，以苏、黄为异端，而（本中）手书立身为学作文之法乃如此，……特立独行之操，谁能及之？”（周必大《省斋文稿》卷十八《跋吕居仁帖》）因此，江西诗派中人在思想政治上既然多倾向于旧党，且其中一些人就出于吕希哲门下，而与吕本中过从甚密，则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亦不能不受党争影响，江西诗派的出现正是在北宋后期党争的背景之下，随时势之演变而逐渐完成的。诗人将审美视野避开政治现实，接受了黄庭坚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有着明确的写作宗旨和共同风格的诗歌流派。

（四）党争与文人集团

文人集团（如“苏门”）的出现也受党争影响。

文人集团与文学流派是两个颇多相同之处而实为不同的概念。文人集团与文学派别的构成，往往以其成员思想政治倾向较接近为前提，但前者又多直接的师友过从，而后者则未必；文人集团与文学流派中的成员一般都能诗擅文，但其文学主张、审美情趣、创作风格等，前者往往并不一致，后者则大致相近；文人集团与文学流派通常都有为其成员所服膺的领袖人物，但领袖与其他成员的交往，前者较之后者，往往层次更为接近；文人集团与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和影响，都有其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但集团的成员人数往往有限，流派则可能人数众多，集团的形成

往往在较短的时期即已完成，流派的形成则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集团往往以其中成员的个人的形式影响后世，流派则又以其整体的力量驻足于文学发展史上。

二苏与苏门弟子黄庭坚、陈师道、秦观、张耒、晁无咎等，组成了北宋最重要的文人集团。二苏及其弟子在思想政治上多偏于保守，在新旧党争中属旧党，这是他们得以结合的前提，又是他们元祐中互相提携、绍圣后屡遭贬斥的原因。苏门之立，又由于苏门诸人有密切的艺术交往关系。他们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既彼此敬慕，相互奖掖，又经常切磋琢磨，酬唱赠答，因而既享盛名于当日文坛，也由此遭到他人的攻击。

文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有才能、有成就、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家主盟，也需要二流、三流的作家群体的协力呼应，二苏及其弟子在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之后，师友过从，切磋唱和，各逞才力，奋力开拓，繁荣了文学创作，提高了艺术水平，成就了一批作家，促进了北宋文学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文学批评的党争色彩

党争对北宋文学批评的影响，可分为三个层次。

（1）文学批评的党争化。党争影响文学，也影响文学批评，有文学对党争的介入，就有文学批评的党争化。“乌台诗案”即为著例。熙宁初苏轼谏新法未被采纳，之后辗转外任，发为诗文，批评新法，讽谏执政，先后为新党中沈括、李定，何正臣等人所指责，且加弹劾，被捕入狱。李、何等人从苏轼的作品中，逐条拈出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以审核，苏轼亦供认不讳。这种批评完全是政治化的批评，是新旧党争的产物。

（2）文学批评的诬陷攻讦。北宋中期以后，诬陷告讦之风很盛，激烈的党争更助长了此风。于是有政治派别不同之人，怀泄私愤之心，以党派之见说诗，无中生有，妄加比附。如吴处厚笺释蔡确《车盖亭》诗，陈举妄言黄庭坚《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

为幸灾等，都属于一种被党争扭曲的文学批评。

(3) 文学批评的党同伐异。思想政治倾向和派别不同，审视文学的眼光往往也不同，文学批评由此染上一层党争色彩。如王安石认为苏轼作《贾谊论》，是附丽欧阳修，苏辙认为王安石《兼并》诗有大病，杨时论诗颂扬程颐而贬抑苏轼，刘攽则又谓王安石《谢公墩》诗不成语，邵博甚而言王安石《歌元丰》为求保全，至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崇熙丰抑元祐，《王直方诗话》、吕本中《童蒙诗训》尊苏黄贬安石，等等，皆受党争影响。

文学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事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物，又有其不可掩盖的审美价值，因此文学批评虽由思想政治观点不同而各异，亦不妨其异中有同。如王安石称赏苏轼《雪后书北台壁》，苏轼、黄庭坚则赞和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程颐亦给王安石咏《张良》以很高评价。同样，思想政治观点相同，文学批评也可能迥异其趣。如欧阳修、石介之批评杨亿，苏轼秦观之评价柳永，皆为其例。

综上所述，北宋党争是一场围绕变法革新而展开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 and 政治斗争，它产生于北宋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背景之上，又反过来广泛影响于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心理。北宋党争对文学的影响有多种层面。作为政治斗争，它影响着文学思想的发展；作为思想斗争，北宋文学思想的三派又属于党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党争影响文学，也影响文学批评，有文学对党争的介入，就有文学批评的党争化和文学批评的被扭曲。总之，政治影响文学，历代皆然，但北宋却更为显著。北宋党争与文学的紧密相关，是北宋文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